



广受青睐的三十六计成书与起源

薛国安

《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因其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被人们誉为“平民兵法”。该书内容源于军事斗争，其影响范围却早已超越了军事领域，被广泛运用在政治较量、外交斗争、体育竞赛、商场博弈、职场竞争等领域之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十六计》的形成和影响

有不少人常常把《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混为一谈，甚至张冠李戴。应当肯定的是，二者都是兵书，而且影响都很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仅从问世时间上来看，《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相比，可谓相差上千年的“后孙晚辈”。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三十六计”一词最早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载：“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其中，“檀公”指的是南朝宋名将檀道济。有些人据此认定，应当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一部类似《三十六计》的兵书，作者就是檀道济。但是仔细阅读《三十六计》后就会发现，书中既引用了唐朝诗人杜甫的诗句，又运用了南宋时期的战例，还提及了元曲中的故事，因而南北朝成书的说法不攻自破。

那么《三十六计》究竟产生于何时、何人之手？由于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学者们只能根据《三十六计》的内容做一些推断。鉴于书中引用了宋元明时期的一些民间故事、典型战例和诗词戏曲，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虽然《三十六计》中的某些计策自南北朝之后就陆续产生并在社会上口耳相传，但是真正形成完整体系的《三十六计》，极有可能在明末清初之际，甚至更晚一些。

《三十六计》成书之后并没有被大量刻版印制，而是作为秘本兵法一直深藏在某家的书斋里，一直到1943年，一位名为“叔和”的人在成都祠堂街一个旧书摊上无意淘到此书。当时，《三十六计》为小32开土纸印本，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但未见作者或编者姓名。篇首有一简短说明，说原书是手抄本，于民国



《三十六计精要新解》，薛国安、樊利君著，新时代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30年（1941年）在陕西彬县（现彬州市）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然后知其果为兵法也。”这个孤本后经无谷（姚炜）先生译注，1979年公开出版，并开始广为流传，现今市面上流行的《三十六计》出版物皆源于此。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加深，《三十六计》也走出了国门，引起国外军界、政界、商界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日本和韩国出版了不少讲《三十六计》的书。日本称《三十六计》是“运筹帷幄的诀窍”，可以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市场竞争、企业经营之中。瑞士、德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先后翻译这本小册子，把它当作“认识中国的军事、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有用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对《三十六计》的青睐。

《三十六计》基本特点

《三十六计》流传于世仅仅八十多年，为什么就能够和《孙子兵法》一样广受欢迎

呢？简单地说，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有三大特点：一是充满智慧，全书充满谋略智慧的色彩；二是非常系统，六六三十六计，涵盖了作战层面各具特色的巧妙计谋；三是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尤其是容易操作。通过与《孙子兵法》对比，这些特点更为明显。

首先，这两本兵书的作者身份相差很大。《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出身于齐国军事世家，祖辈为齐国将军，对其军事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孙武饱经春秋争霸的战争洗礼，对战争的残酷性、暴烈性、不确定性有深刻的体验。尤其是在孙武被吴王拜为将军后，他带兵打仗，驰骋疆场，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理性思考。可以说，孙武是一位职业军人，因此，他在研究战争、探索战争规律、总结谋略艺术方面，更为深刻和精准。

《三十六计》的作者，至今无法确定。人们只能从书中的写作风格、涉及的史料等角度推测。不少专家认为，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喜好历史、文学、军事的老夫子。他借用流传千年的“三十六计”之说，收集了民间流传的一些用兵计谋、成语典故、诗词戏曲等，再加上自己创造的一些计谋名称，按胜战、敌战、攻战、混战、并战、败战六种不同作战状态，编写出三十六条计策，称为《三十六计》。后来，有人在发现这本书之后，为便于阅读，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按语，从军事角度增加了一些古代经典战争案例予以诠释，于是便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三十六计》。这种写作方法融通俗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深受民间喜爱。

其次，两本兵书的思想内容层次相差较大。孙武撰写兵法十三篇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帮助吴王阖闾出谋划策，在诸侯争霸中赢得天下。给君王出谋划策，自然要宏观分析天下大势，综合比较各方竞争对手的实力，系统评估吴国自身的综合实力，然后才能有针对性提出谋略计策。这就决定了《孙子兵法》中主要讲的是战略决策、全局筹划、统军作战、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谋略，可谓大谋略、大思路。用今天的话来说，《孙子兵法》是一部战略学专著。总之，《孙子兵法》主要从战略高度讲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战争的基本规

律，具有很强的哲理性。

相比之下，《三十六计》涉及的谋略更多地偏重于战术层面，主要讲的是操作性谋略。例如，借刀杀人、隔岸观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等，这些谋略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灵活运用，一事一计，可以说《三十六计》是专讲诡道的兵书。其好处是生动形象，易读易记，便于操作。如果用现在专家学者研究国学的思路来区分，《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更多偏重于“用兵之道”的分析，《三十六计》则更多偏重于“用兵之术”的表述。值得肯定的是，《三十六计》对作战层面计谋的概括和表述是系统的，有其独到之处。

最后，从篇幅和语言上来看，《三十六计》比《孙子兵法》更为简短，而且更为通俗易懂。《三十六计》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全书由总论和六套计谋组成。总论实际上是一段简短的引言，指出三十六计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客观情况变化总结而来，要灵活设谋和用谋，不可生搬硬套和预先凭空安排。每套计谋各有六计，共六六三十六计，每计有一小段精炼的正文，说明其基本含义。每计的文字中大多是先按作者自己的理解说明一计的基本思想，接着引用《易经》的言论印证自己的观点。每计后都有一段按语，结合历史故事进一步解释该计谋的含义。

《三十六计》每一计的计名，都高度概括各计所含内容，非常精炼，对每一计的核心原理都有深刻而准确的解析，90%以上的语句直接或间接地出自《易经》中的卦名、卦爻辞。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中的“太阳，太阴”，出自《易经》水火既济卦，说明水在天上，太阳被压入水底，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被誉为“大道之源”，也可以说是“兵学之源”。《孙子兵法》不少谋略思想也源于《周易》。

《三十六计》每一谋略均以《周易》为依据，通俗的文字中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底蕴，给人以更多理解和想象的空间。每一计中所列举的经典战例，又将人们从哲学思维层次引入战争实践层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俗与睿智相辉映，这或许便是《三十六计》在民间深受喜爱、广为流传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为国防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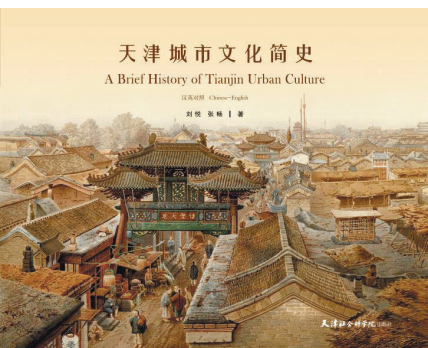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探索

白俊峰 石黛



城市不仅是人类物理空间的集合，更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作为文化容器而存在的。天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兼具古老底蕴与年轻活力。天津的城市史研究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在津派文化研究受到重视的今天，通过观察城市这个文化容器来认识地域历史文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笔者非常欣喜地看到，刘悦、张畅两位学者合著的《天津城市文化简史》近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以图文并茂、中英对照的面貌出现，可谓奉献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礼物”。该书顺应了当下天津历史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不仅为专业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新思路，也有益于在公共层面打响天津的名城品牌，进而讲好城市故事，激发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刘悦、张畅长期从事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尤其对天津近代史颇为熟谙，这部最新专著体现了他们在研究视角、写作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和尝试。该书并非传统意义的志，也不是通常的城市文化通史，正如书名所示，取其“简”而述其“要”，更像是当代人写给城市的深情告白。《天津城市文化简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天津近代百年的转型为主要讨论对象，将城市置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互影响的宏大历史语境中，观察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剖面，给读者展现立体式、多元化城市形象。基于这个思路，作者舍弃了艰涩的术语，通过晓畅的语言，并用图文互读、双语对照的新颖形式，将历史事实与学术认识转化为公众可及可感的“轻阅读”，给读者带来了兼具学术性与阅读张



《天津城市文化简史》，刘悦、张畅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力的体验。《天津城市文化简史》在整体架构、内容设置上颇见匠心。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城市的起源与早期历史”以简略的语言交代了天津城市的发展脉络，特别强调天津的早期繁荣是由于漕运和盐业，这无疑抓住了城市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妈祖文化、会馆文化等文化现象为例，揭示古代天津传统文化的内涵。本章为接下来

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进入后七章的历史情境。随后，作者从城市的空间扩张、交通贸易、技术变革、社会结构、政治变迁、战争影响、市民文化等七个方面入手，分别选取典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揭示城市近代转型的复杂轨迹。特别是第四章“技术革新与城市的变革”，作者敏锐地把握到科学技术与城市工商业发展和自身组织结构演进的内在关系，以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为起点，经民族实业家的本土实践，至化工等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展现了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脉络。作者把天津近代教育发展纳入本章，也体现了对“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的深刻体悟，无疑抓住了技术革新与近代教育的内在联系。这些章节设计是学术思想的反映，凸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认知。

在研究方法上，《天津城市文化简史》采取了“历史分期—外源动力—文化表征”相结合的讨论方式，以历史分期为轴线，纵向串联城市不同发展阶段，勾勒出天津从漕运枢纽、传统城镇向近代城市的演变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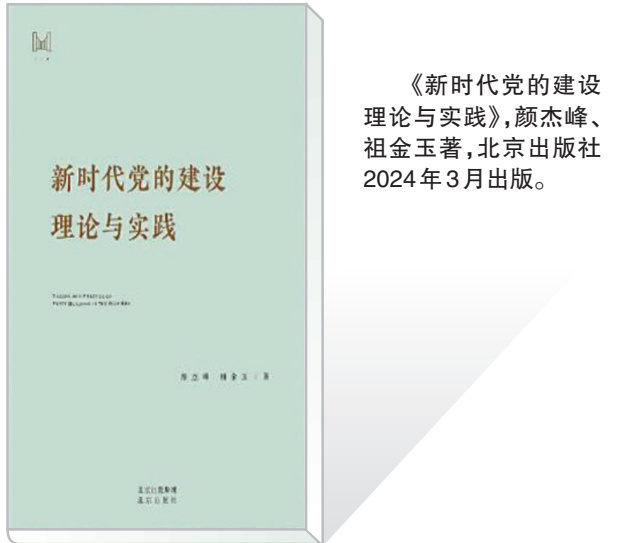
该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视角下移，关注人这个核心要素。作者打破了传统史学对精英叙事的迷恋，将视角聚焦社会史和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空间维度上，第二章“中西碰撞与城市空间的扩张”讨论了租界的设立与城墙的拆除，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背后，小到“看电影要排队，观影时不能大声喧哗”这样的历史细节。社会维度上，第五章“人口、阶层与城市的族群”关注产业工人和

服务业人员，认为工人和贩夫走卒、底层服务业人员“才是构成金字塔形城市结构中庞大基座的阶层”。劳动者在机械轰鸣中、市井吆喝里，以微薄收入支撑家庭，在动荡时局中坚守生存尊严，以集体力量推动城市运转。这样的视角，体现了作者厚重的人文关怀。文化维度上，第八章“中西合璧的近代天津城市文化”通过讨论戏园与电影院、舞厅与俱乐部乃至饮食、服饰、娱乐等，透视市民文化生活的崭新变化。其中，传统戏园设施不断更新，市民热情支持京剧艺术；电影院带来全新的艺术形式。戏园与电影院的共生展现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和天津城市文化的多元普照。这种观察视角不仅契合了城市史研究的取向，也在客观上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型。

翻开《天津城市文化简史》，仿佛推开一扇时空之门。作者充分发挥史料占有的优势，将数百幅珍贵历史照片纳入书中，构建了一个沉浸式的图像叙事结构。图像与文字形成互文效应，不仅记录了城市曾经的面貌，也通过与文字的互读呈现出具象的时代变迁。此外，该书以双语对照的形式出版，打破了传统城市史的本土局限，赋予内容的双重传播价值，提升了对抗性，也拓宽了知识传播的开放性。这个做法值得借鉴。

《天津城市文化简史》开放的讨论方式和与国际接轨的出版视野，都带给人惊喜。笔者由衷希望，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像这样真诚面向公众和期待交流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多一些。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考古部助理研究馆员）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力作

肖光文 李永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要求“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此背景下，颜杰峰教授和祖金玉教授合著的《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和鲜明的实践导向，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为深入理解党的建设规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具有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全书紧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通过严谨的逻辑架构、创新的理念阐释和丰富的实践分析，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全书主要展现了四大特色。

一、理论根基深厚，彰显权威性与时代性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理论深植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所有核心观点均严格对标《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等权威文献。全书系统整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原文与重要文献，充分彰显了理论著述应有的政治高度与鲜明立场，体现了理论研究的权威性与时代性。例如，作者在论述党的思想建设时，梳理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系统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党的重要会议文件，详细论述了如何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使理论阐述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针对性。

二、资料翔实丰富，凸显学术研究的严谨与科学

一部学术著作的学术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论证的逻辑性和资料的充分性上。《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从列出的推荐阅读书目和新时代党的建设大事记，到具体内容中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以及党的重要会议、文件的系统引用，都显示出作者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资料的全面掌握与熟练运用。

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在对党的建设各领域政策演变的梳理以及重要理论观点的阐释上，作者力求言必有据、论必有证。在“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部分，作者聚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命题，通过大量资料详细阐释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过程。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作者通过梳理制度创新的脉络，论证了制度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保障性作用。

三、内容全面系统，构建逻辑严密的整体架构

全书以严密的逻辑架构，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将新时代党建理论定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全书坚实的理论基础。

该书的主题部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统领，依次对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进行系统阐释，各个领域的论述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注重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逻辑推演，使读者能够清晰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脉络和实践路径。如作者在论述党的组织建设时，书中不仅阐述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要求，还详细分析了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具体内容，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实践成效，使理论阐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四、问题导向鲜明，突出实践品格与现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迎难而上，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引领全党开创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局面。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党系统化化解党内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难题的必然结果，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守正创新的实践逻辑。因此，全面归纳总结解决这些难题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入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正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系统梳理和生动呈现这些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作者深入剖析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整治‘四风’问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等重大实践举措，以丰富的案例与数据展现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历史转变。如作者在作风建设部分，详细回溯了中央八项规定的制定与落实过程，通过“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践历程，展现了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智慧。书中特别强调，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这种清醒的认识体现了党对作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深刻把握。在反腐败斗争章节，该书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为框架，系统总结了“打虎”“拍蝇”“猎狐”的实践成效，彰显了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与显著成效，同时深入分析了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理论逻辑，使读者能够从实践案例中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深层逻辑。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